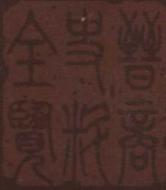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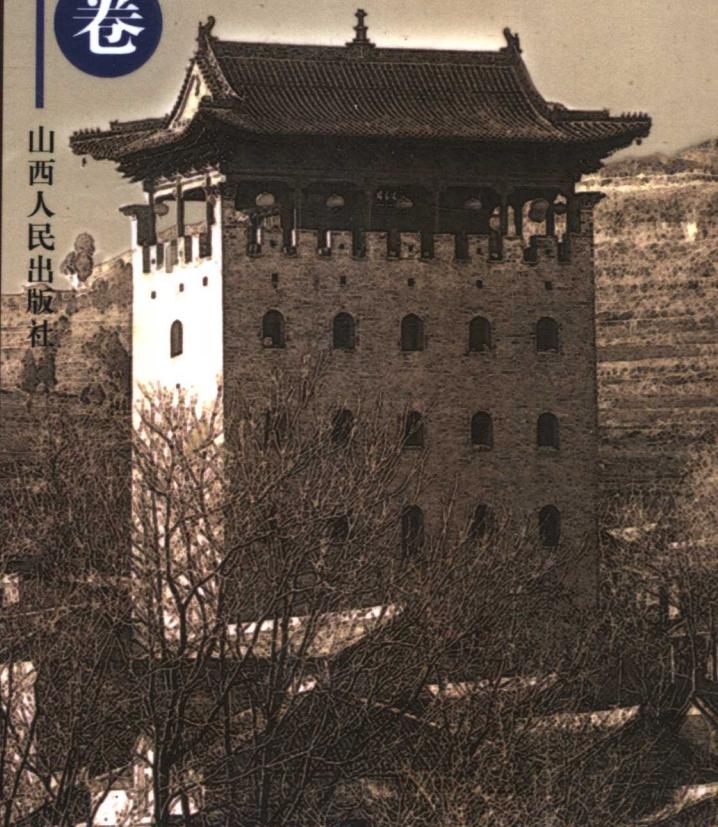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
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

晋商 史料 全览

晋城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商

史料

全覽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
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

晋商史料全览

晋城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 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 - 203 - 05626 - 0

I . 晋... II . ①山... ②晋... III . 商业史 - 史料 - 晋城市 IV . F 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973 号

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

编 者: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 网 址: www.sxskcb.com
辑委员会, 晋城市政协《晋商史 经 销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文颖 莫晓东 新华印刷分公司
出版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 张: 350
邮 编: 030012 字 数: 10000 千字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印 数: 1 - 3000 (套)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E - mail: [Fxzx @sxskcb.com](mailto: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Web@sxskcb.com (信息室) 定 价: 960.00 元 (全套)
[Renmshb @sxskcb.com](mailto: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 刘泽民

编委会副主任 / 薛荣哲 吴锦文 聂向庭 张正明 边鸣涛
吕日周 阎爱英 韩儒英 吴博威 周然
田喜荣 阎沁生 赵政民

常务副主任 / 阎爱英

编 委 /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杰 马志勇 王三星 王计萍 王光彪
王继祖 邓 明 邓培墉 申守文 文志英
石国臣 尹钟子 史海涌 白润明 卢维邦
闫润德 李才旺 李中华 李玉清 李海恒
李儒敏 安双全 安永全 刘太平 师百韧
任铎夫 吕连贵 孙晓玲 孙辅智 杨左卿
杨临生 吴建昌 宋林岭 张云翔 张玉莲
张光明 张岗望 张根成 赵兰田 郑建国
岳纪安 郎宝山 侯文正 殷理田 常福江
程银锁 靳虎松 翟纲绪 樊惠杰 薄良玉

总 主 编 / 阎爱英

执行总主编 / 侯文正

副 总 主 编 / 杨临生 丁 杰 吕连贵

执行副总主编 / 穆雯瑛

编辑部主任 / 穆雯瑛

副 主 任 / 王书福 卢海云 周志清 卢 成 王时杰
张 云

编 辑 /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跃 卫清萍 王志贵 牛 伟 刘 辉
闫晓红 杜海柱 陈 一 杨宇宁 杨静芳
张潇中 侯天保 徐 洋 秦雁亭 阎慧芬
阎恩俊 黄韦衡 温晋生 薛涯滨

《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 殷理田

编委会副主任 / 邓培墉 王玉朝 周佩玉 周海德 王爱枝

冯子良 郭一峰 田 烨

编 委 / 陈厚明 申和金 廖沁平 杨军茂 常振华

马刘勤 李晋生 乔 欣 许永忠 范忠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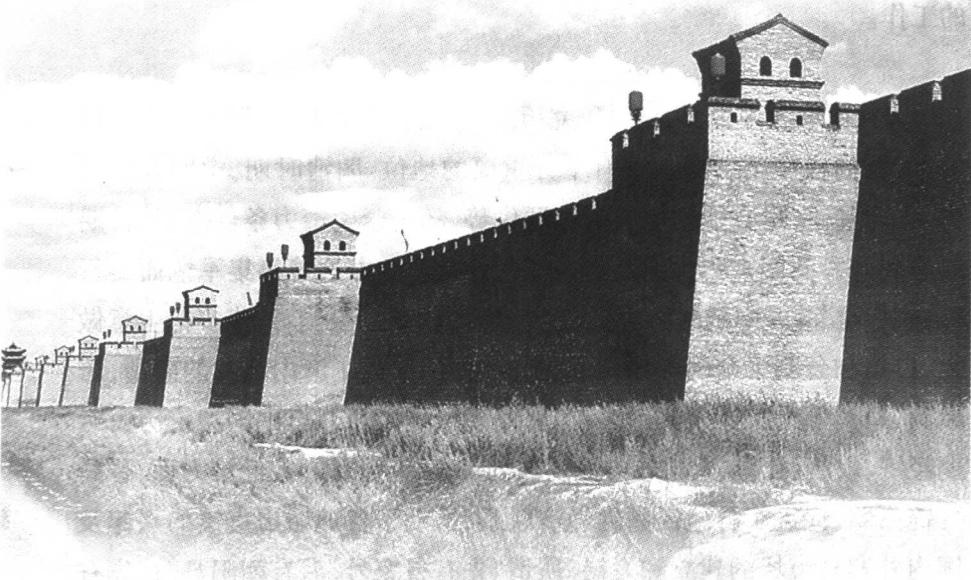
薛玉红 薛 杰 贾祥瑞 李天荣 原晋阳

秦雪清 王翠兰

主 编 / 靳虎松

责任 编辑 / 卢 成

序



总序

山西省政协主席 刘泽民

全面深入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是第九届山西省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从2003年列入计划以来，经过全省各级政协特别是各级政协文史委的共同努力，这套系列丛书将要陆续问世了。应该说这是一件总结前贤、惠泽后人的事情，也是体现政协特点、塑造政协形象的工作。

大凡征编出版史料，是以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为目的的。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虽有盐铁煤炭等资源优势，却由于生产力条件所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明代山西商人抓住朝廷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实行“纳粮中盐”的开中制的历史机遇，走出口外，走向全国，一步步把生意做大，占据和分割了全国市场，甚至走向海外，形成了海内最大的商帮，居徽商、粤商等十大商人集团之首。晋商现象是山西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反映。在经济方面，晋商开辟商路，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及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市”等民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它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先河，汇通天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积累了丰富的商贸经验，创新了经营体制，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如两权分立、掌柜负责制、设立人身股等，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文化方面，它创建了灿烂的晋商文明，以其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晋商精神和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戏曲艺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风尚等，丰富了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晋商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但又不完全是经济研究。晋商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综观国内外晋商研究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就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开始整理晋商文化遗产,并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目的之所在。归纳起来,我想其重要意义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史,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明清晋商已消亡近百年,民国晋商也过去了5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离世,直接反映晋商商人和家族的史料如族谱家乘、墓志碑文、传记家训、店规行规、会计账簿、当票汇票等文献和实物在不断流失;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晋商在全省及全国各地留下的遗址遗迹如商号店铺、作坊宅院、庙宇会馆、碑刻楹联等在不断被拆除或损坏;随着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晋商活动过的商业城镇、商品集散地、商业口岸、商路要地、渡口、驿站所在地等在不断消失;随着晋商后人的去世,一些口碑史料也在不断被带走,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就带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这项工作不但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二是资政,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实施“十一五”规划,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旅游业,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培育新晋商,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些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营哲学和理念,晋商积累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创立的组织制度如行会制度、企业制度、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等,都有可资借鉴的丰富内容。特别对山西来说,晋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促进景点景区的

开发和建设,促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次的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山西人文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

三是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晋商500年的兴衰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晋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山西宝贵的文化遗产。晋商精神中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等思想理念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如晋商以诚信闯市场,以诚信创大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大生意经,对我们今天发展信用经济,构建信用社会,建设信用政府,争做信用公民,就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晋商史料中发现晋商精神的这些亮点,加以总结推广,使之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晋商的兴衰成败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四是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促进晋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晋商研究目前已成为受到省内外相当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就目前晋商史料的发掘来看,却相对滞后。历史上晋商遍布全省全国,但晋商史料的发掘却主要集中在晋中一带,远远不能反映晋商的群体历史。在研究方面,有关专家虽然已经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拓,著作论文也很多,但许多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却大同小异,缺乏新的历史资料,“炒冷饭”的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史料征集工作如果不能有大的突破,晋商研究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广泛、全面、深入地搜集晋商史料,以促进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将晋商研究引向深入。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就是一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山西政协工作实际的举措。首先是省市两级政协和多数县区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有专职或兼职干部,其主要业务就是征集和利用文史资料。其次,各级政协有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就

可以动员一支很大的力量。第三，各级政协相对于政府来说，位置比较超脱，具体事务性工作少，三级政协上下联动可以取得很好的协作效果。从上述几层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政协的一项使命，也是我们履行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工作计划，集中了上下三级政协一定的人力财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晋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兴衰成败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于全国以至海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省内，无论大小城镇，甚至偏远山区，都有规模不等的晋商产生，当时就形成了平阳帮、蒲州帮、潞州帮、泽州帮、汾州帮、太原帮、大同帮、忻州帮、代州帮、崞县帮等商帮。像临县这样的贫困大县，都曾有繁华的碛口镇；像右玉这样的穷县，也曾有兴盛的杀虎口……可见史料十分丰富。但如前所述，目前晋商史料的征集大多仍局限于文字资料，局限于明清时期，局限于晋中地区，这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晋商史料收集的视野和范围，力求收集得更广泛一些，全面一些。因而也把书名定为《晋商史料全览》。《晋商史料全览》是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分专题卷和地方卷。地方卷为综合卷，11个市各成一卷，按专题编排。《晋商史料全览》的所谓“全”，是相对而言，是尽力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一次就把晋商史料全部搜罗殆尽。我们力求做到“全”，一是指在时间上重点突出，主要收编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晋商史料；二是指在地域上全方位，尽可能把全省各个市县及外省市有关地区的晋商史料收编进来；三是指在角度上多侧面，包括晋商的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商路、文献、碑刻、传闻、风俗和其他社会活动史迹等内容。

史料工作，是史学范畴最基础的工作。就像盖楼一样，基础必须扎实牢固，否则楼房就会坍塌。史料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给史学研究造成错误。因此，我们在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重在存史，贵在挖掘，急在抢救。重在存史，就是强调严肃对待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对所搜集到的史料，我们都加以认真细致的整理、鉴别和考证，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一丝不苟，以真实



地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贵在挖掘，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深入下去，发现和搜集各地具体的史迹、史料，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历史文献、文物古迹和民间口碑口述中深入细致地发掘学术界尚未公布的史料。这像采矿淘金一样，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急在抢救，就是要抓紧时间，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老人，抓紧进行访问；对一些很容易失传的老照片、票据账簿、手抄家谱和残碑碑文，抓紧搜集回来；对一些正在损坏的晋商店铺、宅院、码头遗址，抓紧拍摄下来。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史料征集工作，征集到上千万字的晋商史料。

在《晋商史料全览》编纂过程中，我们要求所有编纂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精品意识，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体现史料性，体现晋商精神，体现完整性；力求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号，突出地域特点；力求把好“三关”，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关。一句话，我们力求向社会提供一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实用性强，好看可读的精品图书。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这套书就要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而搜集整理史料的大量工作在市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协领导和文史工作者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基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人员少、经费紧、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甘于寂寞，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我以编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向支持我们编纂出版这套图书的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审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还不高，本套图书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06年5月

本 卷 序

晋城市政协主席 殷理田

序

为了进一步挖掘晋商史料,弘扬晋商精神,山西省政协在2003年做出征编晋商史料的决定,晋城市政协积极响应,并于2005年10月成立了《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委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市、县两级政协组织的共同努力,晋城市的晋商史料征编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透过已征编的史料,我们对泽州商人的兴起、发展和构成的具体情况、对泽州商人行商实践中形成的商业文化等,可以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泽州商人的一些经营理念和行商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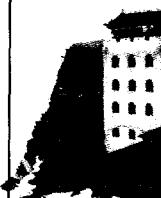
晋城市古称泽州。古代泽州将商人分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黑行商人是从事煤炭和铁业生产及销售的商人,白行商人是从事除黑行以外其他商品生产和贸易以及金融服务的商人。当地有一句俗话说:“黑行兴,百业兴。”黑行的盛衰是泽州商品经济和商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泽州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雨量充沛,矿藏丰富,动植物资源众多。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开发历史,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清至民国时期泽州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矿藏资源方面,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三类。一是铁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泽州就是全国最主要的产铁中心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载:“虎尾之山,其阴多铁。”虎尾山,就是今天泽州大阳镇的一座小山。古代,大阳镇一带,漫山遍野,地上地下,到处都是铁矿。从春秋战国直至清末,这里一直以开采地上明矿冶铁为主,清末才开始凿井采矿。春秋战国时使用的鼓索送风冶铁技术,一直应用到民国时



期。西汉时,这里生产的阳阿剑独步于时。不独大阳,泽州所属五县,铁矿资源都很丰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时,州属阳城县固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为北齐七大冶铁局之一。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泽州冶铁课税30万两(雍正《泽州府志·赋税》)。元时,州属高平县王降村设有专门管理铁业生产的益国铁冶(《元史·食货志》)。“益国铁冶在县北十里王降村,元大德间置铁都提举司益国冶,管勾一员,副管勾一员,司吏二名,至正间废。明洪武间,徙治县北二十里。永乐中,奉工部勘合,为炉冶事革罢”(顺治《高平县志·古迹》)。丰富的铁矿资源,发达的冶炼技术,促进了生产生活用铁器的生产,促进了铁制兵器的生产,促进了铁业生产的发展。二是煤炭。泽州先民使用煤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里的先民们主要是使用露头煤冶铁。最迟至唐代,泽州已可于地下采煤。北宋时期,泽州煤炭广泛使用于民间。《泽州府志·人物》载:“李昭遘知泽州,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常苦其役,为奏,罢铸钱。”陈尧佐为河东转运使,“以地寒,民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由于品质优良,当时的都城汴梁广泛使用泽州煤炭,遂使泽州煤炭日输中州不断。煤炭的开采使用,除本身的发展外,还促进了铁业、硫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硫磺。州属阳城、晋城、陵川都各县具有丰富的磺矿资源,品质和储量以阳城为最。由于有硫磺做原料,早在唐代,阳城就是我国炼丹的主要地区之一。李白在《王屋山与孟大融》诗中写道:“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王屋山即在阳城县南部,诗中的金液即指硫磺。王屋山中的天坛山,向来为神仙道士向往的天堂。北宋以后,硫磺是火工的主要原料,硫磺的生产与销售,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商民根据政府的公文开采冶炼,并将硫磺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当地居民为了生活,有的将硫磺走私到与之相邻的河南等地。硫磺还是重要的医药用物质。此外,铜矿、铝矾土矿、银矿、锡矿等,对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铝矾土为主要原料的阳城乔氏琉璃,从元代至民国时期生产不断,行销大半个中国,北京故宫的屋脊上,都有乔氏工匠生产的琉璃构件。他们生产的孔雀蓝琉璃构件,其生产工艺已经绝传。

在动植物资源方面,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也有三种。



一是桑蚕。泽州是我国最早栽桑养蚕的地区之一。据民间传说，黄帝的妃子嫫祖在泽州阳城的桑林最早发现野生桑蚕，并进行人工栽培养殖，缫丝织布，穿线缝衣，死后被人尊称为纺织神。唐宋以后，反映泽州蚕桑的诗文不绝于史。清末民初，泽州民间还栽种土桑，饲养土蚕，所抽的丝为黄丝。泽州黄丝，除晋城、高平两县织绸外销外，阳城、陵川、沁水三县则直接将生丝运到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等地出售。而销往陕西的生丝，有些又经古丝绸之路到达中亚、欧洲。二是苧麻。苧麻又叫线麻。泽州“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元郝经《罪言书》）。由此可见，元时，泽州是麻布的主要产区，麻布的生产销售，在泽州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泽州陵川所产的麻绳，断烂从外向内，尤为船家所爱，陵川人遂将自己的麻绳铺，从陵川开至沿海沿江的主要商埠。三是药材。泽州向为药材的传统产区，境内山大沟深，草茂林盛，药材种类多、品质好，远销河南、河北等地。与植物相伴生的马、牛、羊、虎、豹、蛇等动物资源，或皮，或毛，或肉，或药，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要使自然资源变成现实的商品，并带动泽州商人走出泽州，还得有其他条件相配合。这些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支移开中。北宋立国后，泽州是国都汴京的北屏障，太原以北就是边关，北宋与契丹、西夏的长期对峙，边关需要驻防大量军队，需要储存大量军需物资。为了保证边关的需要，朝廷诏令泽州各县，将应交纳税赋折实后送往边关，名为“支移”。北宋理学家程颢，在治平四年（1067年）任晋城县令，据《泽州府志·宦迹》记载：“岁有近粟，例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民以为苦。颢择富而任者，预使贮粟于所以待，费大省。”程颢所择富而任者，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商人。这些商人粮贱时在边关购买粮食，或于其他地方购买粮食运往边关，并在那里储藏起来，等到晋城县政府需要交纳时，再卖给县衙，或代其交纳。金代继承了宋代的支移政策。据陵川县龙岩寺现存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重修龙岩寺碑记》载，该村村民支移时，正值金国与西夏交战，村民得佛主保佑，脱离险境，回村后重建佛寺。宋金的支移政策，



到了明代发展为开中制度，商民于边关纳粮和其他等军需物资后，政府付给他们一定的盐引，让其在指定的区域运销食盐。明清两代，山西与陕西、甘肃都是协饷区，泽州商人携货携物入陕甘协饷贸易，不绝于史。除支移开中外，第二个条件是“头下军州”及匠户制度的建立。金国是从部落制迅速发展成封建制国家的，在其封建制国家制度中，有着浓厚的奴隶制痕迹。金代时，泽州是金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金国与宋朝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为了保证铁制兵器能满足作战的需要，金国的奴隶主将领将各地的匠人抓来泽州，在这里设立了“头下军州”。元宋对峙时，泽州又成了元与宋交战的前沿阵地，元代的奴隶主军事首领继承了金代的头下军州制度，建立了匠户制度，由此形成了晋城的“九头十八匠”。九头十八匠是异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匠人残酷剥削压迫的产物，但对泽州铁器手工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匠户不直接为封建政府服役，而是交纳匠价银。在泽州府县两级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中，匠价银的记载屡见不鲜。第三个条件是泽州旱码头的确立。元朝统一中国后，全国大市场得以建立，沟通了江南与漠北的商品联系，重启了东海与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泽州东连山东，西达长安，与纵贯太行以东、太岳以西的两条南北大道形成双十字座。马帮不北上，驼帮不南下，外地客商到了泽州，都要在这里转换交通工具。泽州城及商道上的其他商镇如沁水南阳等，遂成为南来北往客商所携商品的集散地。泽州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也就顺着这些商道，走向异域他乡。这次晋商史料征编中，我们征集到三篇反映驼马帮情况的史料，都是作者采访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后整理而成的，基本反映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泽州与外界商品交换的繁荣景况。其中《民国时期的晋城驼行》写道：“每当秋冬季节，以祁县、太谷商人的驼帮为主，大批从内蒙、晋北一带出发，满载着口外出产的皮毛、药材，络绎不绝而来，在晋城城外大小东关、赵位一带落脚卸货，补充草料饮水，然后又满载着南方上来的茶叶、丝绸和当地出产的土布、瓷器、铁货等物迤逦北返。每当薄暮日落，‘叮当叮当’的驼铃声不断，一队队的驼帮涌入驼行。这时，驼行里汽灯明亮，赶骆驼的西北人依次把牲口赶入指定位置，让骆驼卧下，由当地的帮工把驮解开卸下，放入预定

的货位,让货主认领。然后,西北人把骆驼赶入驼棚,或饲喂,或治病,或钉掌。”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泽州城作为商镇旱码头的具体情况,当可窥其一斑。由于泽州处于沟通东西南北商路的重要区位,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泽州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泽州商人的崛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通过对新征编的晋商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泽州商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因支移和开中制度形成的商人。如前所述,宋金时期的支移制和明朝的开中制,激励商人将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物资运往边关贸易,造就了一批泽州商人。《泽州府志·宦迹》中记述了北宋时河东都转运使陈安石颁发盐券以扼制私盐贩运的史事。当时,泽州一带私盐兴盛,为了扼制私盐贩运,陈安石“出盐付民而俾之券,使遂所得贸易,鬻毕而券归,私贩为减”,政府将食盐专卖的证券颁发给商人,任其在指定区域销售,卖完后,商人再将食盐销售的凭证交还给政府,以此来补偿“贮粟于所以待”的“富而任者”。这为明代开中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北宋时除政府授权下的食盐销售外,私盐的贩运在泽州仍很兴盛。盘山是泽州天井关通往中州的必经之路,也是贩盐的重要商道。明人刘绩在观看宋代院人(宫廷画师)所画盘山图后,对太行山道的商人情况进行了描述:“大车盘盘牵不住,小车碌碌推还去。上孤下孤日千回,不离太行山侧路。吴盐蜀米塞满箱,乌犍耳湿筋力强。商人重货不畏虎,饭牛夜夜宿车傍。妻孥不须念行旅,橐中有金皆乐土。星餐露栉逐队行,但愿利多无所苦。道傍往来多折轴,谁人肯戒前车覆?”(《凤台县志·艺文》)巨大的利益,诱使商人不避虎狼,夜宿道旁,星夜兼程。明清两代,山西与陕西、甘肃为协饷区,泽州商人或纳粮于边取得盐引,或携资贸易随军协饷,由此造成泽州商人在西北陕甘和东南沿海做生意者特别多的现象。张子仁,字体静,阳城县郭峪镇人,生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五月十三日,卒

